

一部资产阶级的福音书

——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

吕 杰

进入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近代历史，在切切缓缓的救亡和改革中崛起了一派——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背靠着积弱积贫的祖国，面对着势强力壮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从改变国策，抵抗外侮，富强中国的愿望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改革主张。在这一派中郑观应是著名的代表人物。

郑观应（1841—1920）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十七岁时，因科举无名，遂到上海经亲戚推荐参加了当时中国主要出口商品丝绸和茶叶的经营。以后四十余年，他先后当过洋行买办。如曾任宝顺及太古轮船公司经理。在洋务派官僚大举兴办新式企业时，他应李鸿章、盛宣怀等人邀请，主持过许多洋务企业。并以商股身份参加过许多重要的官督商办的企业，并担任过重要的职务。如经办过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等。此外他还担任过商办时期的奥汉铁路总经理，创办过进出口业务的贸易公司，在国内各口岸开过航运公司。

在从事上述活动的几十年间，由于他感时忧国，善究思变，先后撰写和辑录了许多议论时政和经济问题的文章，多数在报纸上发表过。早期的文章曾于一八六二年辑成《救时

揭要》一书，由王韬在香港代为出版。至一八九二年又增订改名为《盛世危言》。

这部著作在揭露、批判了列强的侵略活动与清政府腐败的同时，较为全面、细致、具体地提出了一套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很有建树震刷心目。然而，当时资产阶级政治上没有地位，手中没有权力。他的主张既然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就必然和封建统治王朝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大相逕庭而不见容，所以没有实践甚至尝试的机会。最终只是慨言雄谈，在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宝库中留下了闪光的一页。在当时它做为一种追求时代发展的先声和对资本主义兴盛繁荣到来的向往，可以说是一部资产阶级的福音书。

一、倡言商战以卫国，为本国资本主义辟路

郑观应是具有爱国思想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自称杞忧生，是取清朝统治日益腐败，偌大个中国会给帝国主义瓜分掉，不能不杞人忧天之意。

中国社会是被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拖进近代史的门槛。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外国资本主义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在中国开辟了大量的商埠作为经济侵略的重要基地，到九十年代初，列强强迫中国开辟的商埠共三十四处。对中国的商品输出迅速增加，一八九四年比一八六〇年增加了两倍半，而同期中国出口商品只增加了一点六倍、绝大部分年份是入超。①除商品输出外，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在中国办银行，办交通运输、开工厂等。到甲午战前，外商在中国的投资额约二、三亿美元。外商银行在中国吸收存款，发行纸币、控制进出口贸易和外汇市场。其中以英

国汇丰银行（一八六五年开业）势力最为雄厚。外商的航运业，如英商怡和洋行（一八四三年）太古洋行（一八六六年）和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一八六一年）等，垄断了中国沿海和长江的航运。到一八九四年中国共建铁路三百六十多公里，其中近百分之八十是外资控制。②外国侵略势力还控制了中国的海关，英国人赫德从一八六二年起攫取了中国总税务司的要职，成为英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代表人物。

外国资本主义的工商业、金融业日益侵入，使中国本来就弱小的资本主义横遭摧残，发展道路被拦腰截断了。中国资本无论是原料还是市场都和基础雄厚、技术先进的外国资本竞争不过。热望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郑观应，对这一情势看得非常清楚。他说：“今中国虽与欧洲各国立约通商，开埠互市，然只见彼帮商舶源源而来，今日海上开某埠头，明日开内地某口岸，一国争诸国蚁附，一国至诸国蠹从，滨海七省侵成洋商世界，沿江五省又任洋舰纵横。独惜中国政府未能惠工恤商，而商民又鲜有能自置轮船，广运货物，驶赴外洋与之贸易者，或转托洋商寄贩货物，而路隔数万里，易受欺蒙，难期获利。”③在这里郑观应表现了既恨且怨的思想感情，恨外国资本恃强横行，独霸市场，姿意得利。中国资本无法与之开展对等贸易，处于卑弱地位，财力受损，难以发展。怨中国封建统治者“泄泄肖肖苟且偷安”，④不能采取政策保护本国资本主义的利益，造成利外而弊内。

郑观应在长期经商活动的实践中，通过亲自观察，对外国资本主义侵华方式有清醒的认识：“洋人之到中华，不远数万里，统计十余国，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则渐夺华人

之情势，欲服华人之心，阳託修和，阴存覬覦。”⑤由此而言，中国屡败，不仅是武力不如人，更重要的是商不如人，故在各方面都受人欺蒙。由此他因势利导地提出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主张——“商战”。他说：“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加以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生民，且能为拓土开疆也。……彼即以商来，我当以商往。”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来他在追述这段经历时说：“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⑦，力图在商战过程中夺回利权。

他具体提出了商战的十项内容，其中包括“首在振兴丝茶二业……以争印日之权”。“广购新机，自制各色布匹……以与洋布战；”“购机器织绒毯、呢纱、羽毛、洋衫裤……以与诸物战”。并提到多“种甘蔗、葡萄以收糖酒，与诸食物战；广造零星货物，以与洋货战”；又谓“遍开五金煤矿，铜铁之来源，可一战而祛”⑧。这些主张具体而有气魄，也很新颖，合理，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

“商战”是郑观应首先提出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所特有的一个范畴，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它的实质是要求发展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他提出“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⑨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看成是国家的根本问题。由此而言，商战本身并不是孤立的，商即战，战即商，而造成商战能力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所以从内容而言，商又指士农工三者的总体。他说：“富出于商，商出于士农工三者之

力”。⑩这里似乎有一句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资本主义化的潜台词，各阶层人士都要在挽回利权的目标下，为达到与外国资本主义展开对等贸易的水平而努力，以富强中国。

事实上，从反面看，当时如不从挽回利权上想办法，国家确实很难支撑了：“设此国之财竞任滔滔而去，彼国之利不能源源而来，莫塞漏卮，久持坐困”。“再阅百十年，中国之膏血即罄，遂成羸痿痼病之夫，纵有坚甲利兵，岂能驱赤身枵腹之人而使之当前锋冒白刃哉？”⑪可见经济发达与否是一个国家生死悠关的要事。

郑观应从正反两方面较为充分地论证了商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进行商战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可以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受到锻炼，强大起来，成熟起来。提高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成为国家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使资本主义发展得到保证。这也可以说是郑观应的初衷了。

“商战”思想有求独立、求富足，自主爱国，强国的意义，因此这一口号成为当时爱国呼声的一部分，也是新的生产方式出现的一个信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西方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正是这种要求的具体表现，很有时代感。是非常明智而适时的。

二、学习外国经验，促进本国资本主义发展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它之所以没象西方一样，利用十五世纪末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而摆脱“蜗牛爬行的进度”。其主要原因是封建王朝传统的专制愚昧，盲目保守而一直推行闭关政策所造成

的。郑观应由于出身和经历所致，身上的封建性比较少些，是个较为务实的人。他虽然对外国势力侵入中国而“愤彼族之要求”力主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但与此同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世界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大约也受到当时进化论的影响，认为社会发展是“天地自然之理”，世界由戈猎变为耕牧，耕牧变为格致。”^⑫所以他不仅承认外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当时的水平，而且还积极主张学习外国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他能积极地、直接地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只要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便不顾“祖宗之法”极力提倡。与那些封建顽固派惊呼“用夷变夏”，要亡国灭种恰恰相反，他还经常大胆地批判封建当权者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扼制。同时，由于他精通外语，博览中外书报，游历过外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有较多的了解，故能畅言利弊，知晓进退。

如何发展资本主义呢？他借鉴了外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首先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商业。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发达的商品经济。欧洲资本主义就是十四、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商业发达的地区产生的。郑观应在当时虽然在理论上没有如此成熟，但他却从实践出发，提出了重商思想。他说：“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农之本利也，商之末利也，此尽人而能言也。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国不然，各国兼并，各国利己，籍商以强国，籍兵以卫商，其订立盟约，聘向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拓疆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先导，彼不患我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可知欲制

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⑬这种重商思想，不同于清初黄宗羲那种“工商皆本”的论点，也不同于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那种“本末皆实”的论点，它已不是反映封建社会中市民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微弱呼声，也不是那种与工商有某种联系的地主分子的经济利益的表现，而是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封建主义观点的公开挑战。

郑观应清楚地认识到：“商以懋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益于国，与士、农、工互为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生财之大道，而据四民之纲领也。”^⑭他把商业提到了整个国民经济枢纽的地位，认为一个国家的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的发达都必须以发展商业为前提，这实际上也就提高了资产阶级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而在当时提高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一环。进一步设想，在中国历史上如果资产阶级曾经有过较重要的社会地位，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的权力，那么中国的资本主义即使碰到一些困难，也能按照它应有的途径走上正规的发展道路。

既然商业如此重要，那么工业就必须与之并驾齐驱了。因为商业是工业发展的动力，而工业是商业发展的基础。“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已。”^⑮所以要“以工翼商”。他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提出“人尽其才”，“物尽其力”，“地畅其流”的主张^⑯。是要利用中国的资源和人力以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这在同时代的人中可谓是绝唱了。

他非常重视大机器工业生产，如果中国在没有自己工业基础的情况下与外国通商贸易，纵有丰富的资源，也只能为外国列强提供掠夺的对象而已。到后来他通过自己主持经办的近代企业的实践，更加清楚地看到，为了在经济上保持独立，谋取利益，中国不仅要仿效外国发展一般的近代企业，还必须建立自己的机器制造业，即生产工作母机。他说：

“尝阅西书，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中国自设立制造局……但知购办机器，可得机器之用，不知能自造机器，始能得机器之无穷之妙用也。宜设专厂制造机器”。^{①⑦}这比洋务派只兴办新式工业企业要进步多了。这里提出了一个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的问题。向外国学习先进经验是应该的，但不能依赖于人。那样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自己得不到独立的发展，反而要受制于人。郑观应就从反面论述了其弊病：“然各种机器仍须购自外洋，可恃民间购取之不便，而洋人明知华人不能自造，往往格外居奇，要求善价，且多有以往用过之旧物售之中国，而中国暗受其欺。且置一机器不知其所以然，但知其所当然，偶一损坏，仍须请洋人修理，设洋人不肯修理，则有机如无机同，其有不受制于外人者乎？”^{①⑧}论述得多么深刻而一针见血啊！要解决根本问题，就要从根本上学，学人家的方法来做指导，制造自己的东西。郑观应提出了一个向外国学习先进经验和技能时杜绝盲目性和依赖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广义上讲，对一个民族来说，不论什么时候都有向其他民族学习的可能和必要，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但无论什么时候，学习都要从民族的独立立场出发，力争解决根本问题，如果只学皮毛，浅尝辄

止，势必轻浮，甚至适得其反。郑观应提出的这个问题，无论对当时，还是对后世都有现实意义。

为了摆脱封建主义束缚，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促进本国资本主义发展，郑观应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有针对性的主张：

第一，要求尊重私人资本发展工商业的自由，反对政府强行干预。他说：“故欲整顿商务，必先俯顺商情，不强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不强其所差而就其所乐，而后能推行尽利，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与铁路、轮船、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力，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①⑨}发展私人工商业、这在当时是封建政府和私人资本所有者之间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封建统治者限制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就是担心资产阶级的势力强大起来威胁到封建统治的基础，而资产阶级也恰恰是由此与封建主义离心离德，要求变更封建统治。发展私人工商业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关键一环。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来看，私人资本的自由竞争是其有赖于发展的催化剂和加速器。欧洲的资本主义就是从冲破了行会的束缚，实现了自由竞争而后发展起来的。郑观应提出了这个主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描绘了光明的前景。

第二，要求政府撤卡裁厘，减轻商民负担。他批评封建政府“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官不能护商，反而能病商，其视商人之羸绌也，如秦人视越人之肥脊。”^{②⑩}中国工商业发展不起来的原因“非但集股难，亦因政府抽税厘过重。”故此他要求“痛除积习。妥安新章”，^{②⑪}合理地抽厘税，以给资产阶级更多的盈利机会。

第三，要求保护关税。保护关税制度，就是利用国家政权保护本国的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竞争时保持有利地位，曾在各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了很有效的作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远远地落后于外国，在中国市场上中国商品，没有竞争能力，处于劣势，大量外国商品涌入。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被挤垮的危险中挣扎。郑观应目睹着危机，大声疾呼：“务将进口税大增，出口税大减，则漏卮可以渐塞，膏血可以取回，此其权在上而必大为变通者也”。^②

第四，主张仿效西方建立官、商银行，发行银行券，用机器铸造金、银币，禁止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他提出：“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③充分肯定了银行对促进工商业所起的作用。他对有中国人股份的汇丰银行“不与华商往来”的作法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强调“非筹巨款创设银行，不能以挽救商情而维持市面。”^④

以上这些具体主张，如果在当时一一变为现实，那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将是非同凡响的。甚至也会引发起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然而它们终究没有变成实现，象福音一样，在可望不可及的上空回荡着，带给人们希望和惆怅。

三，主张政治改革，为资产阶级争取参政权

郑观应通过长期的观察和体验，认识到：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⑤这一发现使他相信，进行一些政治的社会的改革，是使中国富强起来的必要途径。首先他承认，社会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物极则变，变久则通，虽以圣继圣而兴，，亦有不能不变，不

得不变者，实天道、世运，人事有以限之也。”^{②⑥}又说：

“千古无不弊之政，亦无不变之法。”^{②⑦}他说的变法关键是设立议院，“中原大局，列国通商，势难拒绝。不得不牵之以公法，欲公法之足恃，必先立议院，达民情，而后能张国威，御外侮。”^{②⑧}有了议院，则一切民隐民情具可上达，不但如此，国家有事可以齐心对外，这是动员人民的办法。而且议院可以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以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以积其怨。”^{②⑨}这是立国的最基本条件。郑观应主张君主立宪的国家形式，他说西洋政制“君之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此制即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③⑩}同时他也清楚地交待了这一新制度下，国君的权利所在：“凡军国大政，其权虽决于君上，而度支转饷，其权实操庶民。^{③⑪}看来他的注意力主要还是放在支配经济上。这里所说的庶民，当是资产阶级，他极力要求资产阶级参政，“天下事，必以出钱者力主。”并提出了政府议员的条件：“非入本籍十年以来，及年届三十，并有财产身家，善读书，负名望者，亦不得出名。”^{③⑫}他幻想着资产阶级能和现存的封建王朝并驾齐驱，管理国家，虽有些不伦不类，但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了。

郑观应还针对当时有人认为中国要实行立宪制度，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中国民智未开，知识程度不够，既设立，亦不宜当下即设等，提出了反驳，他说：“此乃寻常人之见也。昔法国维新之时，民智亦未开，先设议院，开国会，变通制度，扫除积弊，立致富强，未闻先设议院之害。”^{③⑬}在这

里反映了郑观应对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已有了了解，并持着推崇和效法的态度。盼望着有一天在中国也实现变法，以偿宿愿。

为了寻找资产阶级参加国家管理的机会，他还具体提出了要求在中央设立商部（实际上是兼理商、工矿、交通各业的济经部）在各省县设立商务局和商务所，“由地方官举素有声望之绅商为局董。”同时还建议组织商会，这说明资产阶级要求参加工商业和行政管理的权力，成立保护本阶级利益的组织，以抵抗官府病商的种种苛政。

他不仅要求政治制度的改革，还要求进一步改革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他要求社会上“切勿薄视商业”^{③④}而要给商业、工业资本家以较高的社会地位，“予以体面”。他批评封建士大夫阶级不苛言名利，而又实际追逐名利的伪善态度，指出“人之所重，名利二端。”公开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在他看来，人们追逐名利是正当的，无可厚非，问题是必须在社会道德观念上予以承认。他要求树立“做商得财，人皆仰之；做官得财，人皆鄙之”^{③⑤}的资产阶级道德观念。为发展资本主义做舆论工作。

此外，他在论述改革教育方面也有独到之处，力主教育为发展资本主义服务，培养学用一致的人才。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详述了。

四、综述

在近代史上，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有其特有的光彩。一部《盛世危言》以它的见解精辟、新颖、大胆而独秀群。启发教育了一代人，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震动。它对于摧毁封建顽固思想的堡垒，传播爱国主义起了很大的作

用。对于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新生产关系的产生也起了促进作用。并且在十九世纪末的思想界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他继承和发展了冯桂芬的“师夷长技以救国，”王韬的“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薛福成、马建忠的重商主义思想。形成了他自己的两个十分有价值的见解：一是商战，二是设立议院。把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发展到一个高度，为以后改良主义运动高潮的到来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但是，郑观应毕竟是从买办阶级转化来的商业资产阶级，主要是代表他所在的那个阶级利益讲话的，他虽然也说是为民，其实主要指商人及与商务有关的人民。他对太平天国是惧怕的，可见他所指的人民，虽然包括有技工、小商人，城市中的知识分子等，但范围极小。所以他当然不会相信群众有力量改造社会，建立新制度。于是他必然对统治阶级抱有幻想，以为自己的思想，只要缓和点，论述的入情入理，就有可能被统治阶级采纳。也因此，他总留着一个封建主义的尾巴，不能痛快割掉。他著的文章，总是先说中国古法良，今法坏；西法袭自中国古代。避免从根本上触动封建统治者。这种思想方法，实际是软弱无力的改良主义所采取的妥协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是不得进取的。郑观应虽然在理论阐述上有见地，有气魄，但在实际斗争上就没有根基了，经不起挫折和失败。结果他晚年由于政见不得实现，遭到统治集团的冷落排挤，加之经济上的失利，而灰心愤世，失意丧志。几乎完全转学丹道，大谈忠孝节烈，善恶贞淫以及因果报应。迂腐至此，与初期奋发图强，忧国忧民的郑观应已判若两人。

这是他的悲剧，也可以说是整个改良主义派的悲剧。

注：

- ①②叶世冒编著《中国经济思想简史》
- ③郑观应编著《盛世危言》商务（光绪二十四年石印本）
- ④《盛世危言》后编《上戴少怀尚书书》
- ⑤《盛世危言》传教（以下均出自《盛世危言》中的各篇）
- ⑥商战
- ⑦自序
- ⑧⑨商战
- ⑩商务
- ⑪商战
- ⑫教养
- ⑬⑭商务
- ⑮商战
- ⑯自序
- ⑰⑱⑲⑳㉑㉒商务
- ㉓㉔银行
- ㉕议院
- ㉖公法
- ㉗考试
- ㉘㉙㉚议院
- ㉛公举
- ㉜议院

③③ 《盛世危言》后编卷一

③④③⑤③⑥ 《盛世危言》三编卷二捐纳

此文还参考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赵靖、易梦虹编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文章